

聚焦数字与遗忘： 海外媒介记忆研究的图景与路径

邵鹏¹，张晓蝶¹，张馨元²

(1.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2.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海外对于媒介记忆的关注由来已久，相关的学术发表也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研究提供了指引。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1993—2021 年间关于媒介记忆研究的 1386 篇有效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国外分外重视媒介记忆领域的学术研究，研究整体呈现向好态势，年度发文量呈螺旋式增长，尤以近 3 年的发文量为代表。从空间分布上看，海外媒介记忆的研究仍然以美国、欧洲为“重镇”，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该领域的国际发表仍然稍显落后；从学术共同体建设上看，媒介记忆研究的机构与作者合作网络均较分散，学术共同体有待建构。目前，海外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记忆的功能研究、媒介对记忆的塑造策略研究以及媒介技术的作用研究这三个维度。未来媒介记忆的功能研究依然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且随着媒介的更迭，研究视角也将持续拓宽。此外，数字记忆或将成为记忆研究的又一沃土。

关键词：媒介记忆；Citespace；共现分析；研究热点；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3) 02-0011-15

记忆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生理功能，人们凭借记忆留存经验。但正如德拉埃斯马所述，“人类记忆与人类发明的记录方法密不可分”，^[1] 记忆通常需要通过物质化的记录才能摆脱被遗忘的宿命，实现延续和传承的使命。媒介作为一种物质实体，提供了激活与唤醒尘封状态记忆的可能。从同质性来看，记忆问题是一个隶属时间范畴的问题，而媒介亦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概念工具，在口述记忆时代，记忆仅依托身体媒介加以短暂保存，凌乱与琐碎是该阶段难以摆脱的弊病；文字记载诞生后，印刷媒介发挥了文字记忆作用，过去的经验可以被反复理解，随时调阅，记忆开始走向严谨和系统化；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多样化的媒体形式丰富了记忆的感官体验与传播渠道，记忆开始被传播与强化；^[2] 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后，互联网的更迭热潮催生了数字记忆的新模式，记忆变为“永生”，触角延展至地球村的每个角落。不同的媒介以呈现与重现的统一机制对抗时间的消逝，媒介形态的每一次演进都带来了人类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并促化了人类记忆的发展。由此，从媒介视角开展记忆研究的媒介记忆理论成为开辟记忆研究新蓝图的重要方向。

媒介记忆 (media memory) 是在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提出的集体记忆 (collective memory) 的基础上，耦合媒介研究的相关机理而衍生出的全新记忆研究视角，其强调媒介对于记忆的存储、保温与再现等中介功能的同时，关注如何利用媒介来勾勒人物群像、建构社会现实。媒介记忆概念的诞生得益于“追溯历史、回顾过去”成为仪式性的动作，也得益于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度嵌入，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码、存储、提取和传播，形成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3] “媒介即讯息，媒介即记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集体记忆的形成机理与话语演变研究” (19YJCZH16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 (18BXW062)。

作者简介：邵鹏，男，教授，博士；张晓蝶，女，硕士研究生；张馨元，女，博士研究生。

忆”，媒介成为一切记忆的外包形式，从而为记忆的研究明确了主线，系统化的记忆研究格局也由此开始形成。^{[3](84)}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就国内不同阶段的媒介记忆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周海燕在2014年的梳理中尚在遗憾“国内该领域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并指出，民族认同的传播与共享记忆、大众文化与集体记忆、全球化传播语境中的集体记忆以及新媒体与集体记忆是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热点。^[4]此后，李红涛、黄顺铭将媒介记忆的边界予以框定，认为新闻生产是最重要的记忆实践，并引出了与媒介记忆相关的几组批判性议题。^[5]周颖的综述性文章《对抗遗忘：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对媒介记忆研究进行理论溯源，总结了我国媒介记忆研究的现实之困，着重分析了中国学界在媒介记忆研究视角与方法上的可突破方向，并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媒介记忆的全球流动”“媒介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创伤记忆”“数字技术带来的记忆革命、引发的数字危机”将成为中国未来媒介记忆研究的主要面向。^[6]陈雍基于CNKI数据库对国内近十年的媒介记忆文献进行的计量分析，发现十年来国内媒介记忆研究如火如荼开展，研究数量呈现增长态势，并归纳出“集体记忆、文化传播、建构、汶川地震、非遗文化、网络热点事件”是国内研究的主要方向，“互联网历史、灾难记忆、叙事”是研究的前沿主题。^[7]

综合来看，我国的媒介记忆相关研究立足本土文化建构，逐步朝纵深发展，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关照媒介记忆研究聚焦特定主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也存在研究范式单一且固定，研究目标分众而零散等一系列问题。要突破目前学界研究的创新瓶颈，需要“充分认识到媒介记忆在差异化历史时期承担的责任，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记忆生态与记忆需求”^{[6](165)}，对发展我国的媒介记忆学术体系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美国核心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作为文献检索库，拟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与媒介记忆相关的1386篇国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系统化、国际化的视角清晰呈现国外媒介记忆理论的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媒介记忆的研究范式拓展、实践进路探索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①国外媒介记忆研究现状如何？②该领域的研究聚焦哪些核心热点？③研究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二）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以文献的外部特征为基础，采用统计学原理对文献所属科学领域的总体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知识图谱属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范畴，以知识域为对象，通过对知识的数据挖掘、处理与计量，最终实现对知识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图形表达。^[8]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分析一定程度上能克服研究者存在的主观性和由此导致的思想片面性，使研究结果能够基于公允的数据和可视的图表客观呈现。因此本文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对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三）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Citespace5.8.R3版本对国外媒介记忆研究的国家、机构、作者合作网络和文献共被引情况以及关键词情况进行图谱分析，辅之以Excel表格对发文量和影响力期刊数据进行整理。Citespace是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团队研发的一款基于JAVA语言的信息可视化工具，共引分析和寻径网络算法是其运作的最大亮点。使用者利用该软件可以对文献进行科学计量，生成能够展现知识单元之间复杂

关系和互动情况的知识图谱。^[9]

(四)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将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合集中社会科学索引 (SSCI) 作为文献数据来源, 利用数据库基本检索功能, 以“Media Memory”(媒介记忆) 为主题, 文献类型为“Article”(论文) 和“Review Article”(综述论文), 不限定时间范围, 经过样本清洗和筛选, 最终保留 1386 篇有效文献, 其中论文 1360 篇, 综述论文 26 篇, 文献最后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7 日。

二、研究整体形势

本部分将从媒介记忆研究的时空维度、高影响力期刊、作者合作网络以及文献共被引等角度切入对国外媒介记忆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使该领域的整体形势能够一目了然。

(一) 年度发文量

某研究领域发文量的起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热度的变化。由图 1 可知, 媒介记忆的研究从未止步, 发文量总体呈现波动增长态势。根据文献的年度发表趋势可以将媒介记忆的研究大致划分为发初期 (1993—2004 年)、发展期 (2005—2014 年)、繁荣期 (2015—2021 年) 三个阶段。

1993—2004 年该领域研究缓慢起步, 属于研究的发初期, 这 12 年的发文总量占比为 8.5%, 年均发文量约 9.8 篇, 可见媒介记忆萌芽之初发展缓慢, 只在学界泛起了微微涟漪; 2005—2014 年研究开始增速, 步入发展期, 这 10 年的发文总量占比为 31.3%, 年均发文量约 43.4 篇, 比上一阶段翻了近 5 番, 表明媒介记忆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2015—2021 年 7 年的发文总量占比达 60.2%, 超半数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产出, 年均发文量约 119.1 篇, 预示该领域研究进入繁荣期, 从图中可以发现研究在 2020 年迎来发文量峰值 168 篇, 尽管之后有下降的趋势但可以明确的是媒介记忆已成为备受重视的学术研究领域, 故而未来的研究趋势势必会呈螺旋式上升。

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最早涉及媒介记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93 年, 代表性成果是肯尼斯·莫里斯 (Kenneth Morris) 和巴里·施瓦茨 (Barry Schwartz) 的《他们为什么喜欢艾克: 传统、危机和英雄般的领导力》, 文章以报纸、杂志、民意调查报告等一系列记忆承载物上关于艾森豪威尔的评价信息作为研究样本, 这些非代表性的媒介样本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文化对象的价值, 因此研究者试图借此了解公众对这一政治英雄人物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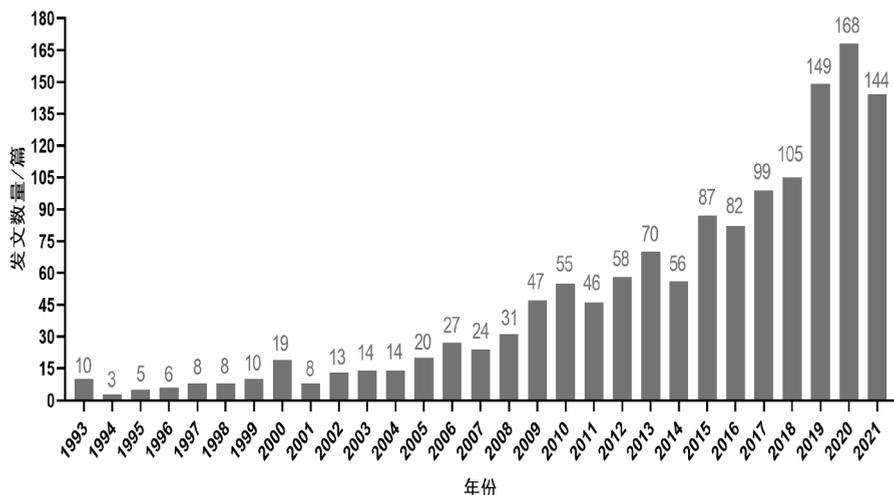


图 1 媒介记忆年度发文量情况 (1993—2021)

（二）文献期刊分布情况

通过梳理文献来源的期刊分布，可以发现该领域研究最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从而为研究者提供高价值的参考文献。经统计，媒介记忆的研究分布在 431 种期刊上，涉及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现选取相关文献刊载量排名前十的期刊，制成表 1。

期刊 *Memory Studies* 发文量总计 95 篇，以绝对优势占据榜首，该期刊聚焦记忆研究，研究主题的针对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期刊媒介记忆文献含量高的原因。安妮特·库恩（Annette Kuhn）于 2010 年发表的《记忆文本与记忆作品：记忆在视觉媒介中的表现》凭借高被引频次成为该期刊的标志性成果，此文将记忆在电影中的呈现方式称为记忆文本，将承载记忆的照片和相册称为记忆作品，指出记忆借助物质文化和纪念实践走向制度化。文章通过观察来自英国、苏格兰、加拿大和中国的记忆文本和记忆作品，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的视觉媒介是如何动态重现过去的”这一问题。^[11] 期刊影响因子代表期刊的学术影响力，*New Media Society* 期刊影响因子高达 8.061，发表媒介记忆相关文献 25 篇，如表 1 所示，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期刊中绝大多数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 3，可见媒介记忆研究已受到传播学界权威期刊的青睐。

表 1 文献来源期刊分布（1993—2021）

排名	期 刊	篇数	影响因子
1	<i>Memory Studies</i>	95	1.589
2	<i>Media Culture & society</i>	35	3.272
3	<i>Communication Research</i>	33	4.856
4	<i>Media Psychology</i>	32	3.824
5	<i>Journal of Advertising</i>	30	5.522
6	<i>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30	7.270
7	<i>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i>	28	3.154
8	<i>New Media Society</i>	25	8.061
9	<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i>	24	4.620
10	<i>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i>	18	2

（三）国家和机构共现分析

媒介记忆发文国家（地区）和机构的分布彰显该领域研究的地域特色。从空间分布上看，媒介记忆研究的学术版图呈现以美国为首、亚欧国家持续发力的特色，国家间存在相互合作，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全球媒介记忆的研究，其余各国在媒介记忆研究数量与质量上均有待加强。就研究机构而言，美国的研究机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机构间有联系但不紧密。

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发文量整理的表 2 显示，媒介记忆研究数量排名前十二的国家（或地区）依次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荷兰、中国、以色列、加拿大、西班牙、瑞典、苏格兰、南非。其中，美国共发文 499 篇断层式领先，在该领域具有绝对影响力，中国发文量尽管位居第六，但只有 52 篇，可见国内媒介记忆研究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难发现，美洲、欧洲等发达国家是媒介记忆研究的主力军，研究的空间失衡现象突出。此外，研究者为了解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将 Citespace 的“Node Types”（节点类型）设为“Country”（国家）进行图谱绘制，得到图 2 的国家合作共现图谱。该

图谱中共有 109 个节点, 121 条连线, 密度为 0.0206, 表明媒介记忆研究并非国家间的零和博弈, 相反, 国与国的合作时有发生。从反映节点重要程度的中介中心性指标来看, 美国 0.37 的中心性意味着其在媒介记忆学术研究领域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德国次之, 中心性为 0.12。其余各国的中心性皆不足 0.1。

将 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设为 “institution” (机构), 运行软件得到图 3 的机构合作共现图谱。该图谱密度为 0.0021, 可见媒介记忆领域的各研究机构合作关系网络已经形成, 但仍处于松散状态, 机构间的学术交流有待加强。其中, 英国的伦敦大学深耕媒介记忆研究, 发表 45 篇相关论文。除此之外,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42 篇)、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30 篇)、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29 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28 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26 篇) 都是极富代表性的媒介记忆研究机构, 核心机构的地域分布与文献的国家分布不谋而合, 美国研究优势资源集聚效应明显, 研究领袖地位已然确立。

表 2 媒介记忆研究文献国家/地区分布 (1993—2021)

国家/地区	发文量	占比	国家/地区	发文量	占比
USA (美国)	499	36.003%	ISRAEL (以色列)	48	3.463%
ENGLAND (英国)	167	12.049%	CANADA (加拿大)	42	3.03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98	7.071%	SPAIN (西班牙)	36	2.597%
GERMANY (德国)	90	6.494%	SWEDEN (瑞典)	32	2.309%
NETHERLANDS (荷兰)	75	5.411%	SCOTLAND (苏格兰)	26	1.876%
PEOPLES R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52	3.752%	SOUTH AFRICA (南非)	26	1.876%

CiteSpace, v. 5.8.R3 (64-bit)
 March 11, 2022 10:21:26 AM CST
 WoS: /Users/BAKEL.ANELA/Desktop/0307媒介记忆计量/wos数据分析/data
 Timespan: 1993-2021 (Slice Length=1)
 Selection Criteria: g-index (k=25), LRF=3.0, L/N=5, LBV=8, e=2.0
 Network: N=109, E=121 (Density=0.0206)
 Largest CC: 55 (50%)
 Nodes Labeled: 2.0%
 Pruning: Pathfin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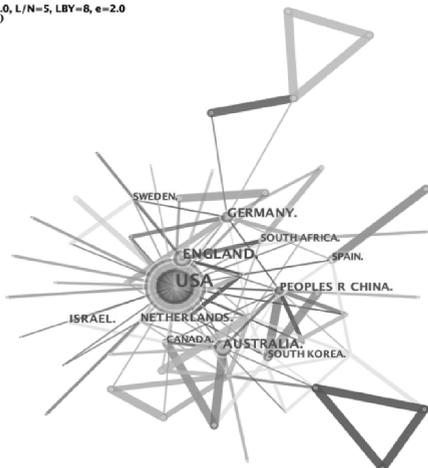


图 2 媒介记忆研究国家合作图谱 (1993—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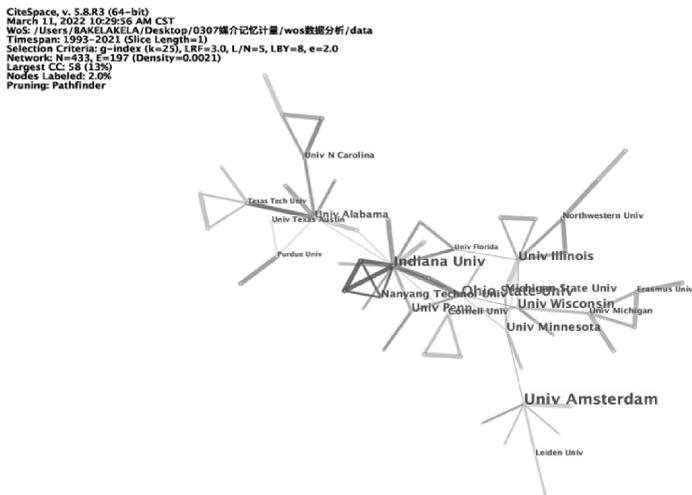


图3 媒介记忆研究机构合作图谱（1993—2021）

（四）作者及其合作网络

富有影响力的作者群往往在某一领域起风向标的作用，通过对媒介记忆研究作者情况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该领域的最新科研动向。将 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设为“Author”（作者），运行软件后生成具有 635 个节点、208 条连线、密度为 0.001 的作者合作图谱（见图 4）。在该图谱中，节点代表作者，连线代表合作关系，密度代表合作的紧密程度。媒介记忆领域作者队伍的松散情况显而易见，该领域学术研究多由作者独立完成，仅有少数作者间形成了简单的合作关系。作者在某一领域学术成果的多寡反映其对该领域的贡献程度，在媒介记忆领域成果产出量最多的 5 位作者分别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伊蒂丝·史密特（Edith G. Smit）和哈迪·福沃德（Hilde A. M. Voorveld）、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埃夫兰（W. P. Eveland）、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克莱尔·塞金（Claire M. Segijn）、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诺姆·蒂罗什（Noam Tirosh）。值得注意的是，发文量前五的作者中有三位作者伊蒂丝·史密特、哈迪·福沃德、克莱尔·塞金合作发表了 4 篇文章，其中克莱尔·塞金在 2016—2017 年间任职于阿姆斯特丹大学，而后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这可以解释为何这三人之间会形成合作网络。

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Carolyn Kitch）作为媒介记忆概念的提出者，在该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 2002 年发表的《“美国家庭的死亡”：媒体悼念小约翰·F·肯尼迪过程中隐含的神话、记忆和国家价值观》一文中表示新闻媒介是社会表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理想之地。此外，文中还提到杂志因其具有的物理持久性成为媒介记忆的试金石。文章重点关注“1999 年小约翰·肯尼迪之死”这一媒介事件，从叙事和修辞的角度对 5 家美国杂志在小肯尼迪去世后两周内共计 468 个社论版上的所有相关文章和照片加以分析，进一步探究杂志在抒发情绪、创造神话、唤醒记忆、定义和保存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2] 2008 年，卡罗琳·凯奇在 *Memory Studies* 期刊上发表文章《将新闻业置于记忆之中——以及记忆研究》，作者在文中梳理了媒介和记忆的关系，将媒介界定为记忆建构的场所，认为媒介所生产的新闻是记忆的初稿，不仅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整合了离散的记忆，而且愈发成为众人评价制度和文化的论坛。^[13]

就中国学者而言，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Lee Chin-Chuan）和浙江大学李红涛教授（Li Hongtao）属该领域国际发表的领军人物，二者间已形成了一定的合作网络。两人的研究根植于西方媒体生存的场域，试图将媒介记忆与国家利益统筹起来考虑，重点探讨西方媒介对于关键性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建构策略。李金铨和李红涛认为周年新闻是一种极具研究价值的新闻模式，该模式

结合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以纪念性的叙事方式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创造了一个具有社会敏感性的合法记忆场所。两人将媒介事件视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因而从符号学视角出发,考察了美国主流媒体中有关重大媒介事件的周年报道话语。他们指出该话语不仅是影响公民认知效果的重要因素,更是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不过,两人在国际期刊上仅合作发表 3 篇有关媒介记忆的文章,不难发现,或囿于自身对西方情境的解释力有限,亦或囿于语言转译的困难,华语世界的研究者在媒介记忆领域的科研生产力尚显不足,由此导致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国际影响力的相对羸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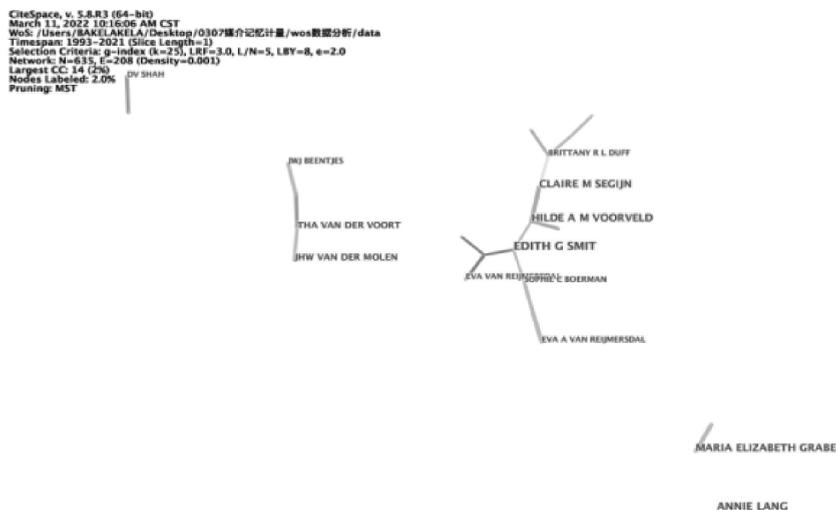


图 4 媒介记忆作者合作图谱 (1993—2021)

(五) 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是指两篇(或多篇)文献同时被其他文献所引用的情况,通过对本文中研究样本的参考文献进行共被引网络分析,可以获悉该领域研究的知识基础。将 CiteSpace 的节点类型设为“Reference”(参考文献),运行软件得到共被引文献分析图谱(见图 5),同时整理出被引频次排名前 5 的高被引文献(见表 3)。结合图表可以发现图谱密度仅为 0.0046,由此可以推断与媒介记忆研究有关的知识点还不够集中,高价值的文献还有待创作。

以色列学者莫蒂·奈哲(Motti Neiger)、奥伦·迈耶斯(Oren Meyers)、伊亚尔·赞德伯格(Eyal Zandberg)共同编撰的《论媒介记忆》一书被引量最高,达 23 次。此书以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为基石,创新性地考虑到媒介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自然地将“媒介”和“媒介化”引入记忆的研究逻辑中。全书呈现了超 20 位学者在媒介记忆领域的学术成果,分别从“媒介记忆的认识论”“媒介记忆的伦理性”“媒介记忆与大众文化”“媒介记忆与新闻业”“媒介记忆的未来”等五个维度全方位展示媒介记忆理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媒介记忆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14] 何塞·范·迪克(Jose van Dijck)在《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被引频次为 17)一书中将媒介化记忆视为一个在时空中均保持运动状态的过程,并强调媒介化记忆的跨学科性质。全书通过以下七个主题重点探讨了媒介技术在塑造记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如何深刻影响记忆与经验、私人与公共、自我与他人的关系:①视为概念工具的媒介化记忆;②数字时代的记忆问题;③书写自我的媒介;④媒介记忆的留存与保温;⑤静态图像的记忆建构方式;⑥动态图像的记忆建构路径;⑦记忆媒介的演进。^[15] 瑞典学者安妮·考恩(Anne Kaun)和弗雷德里克·斯蒂尔恩斯泰特(Fredrik Stierstedt)的《脸书时代:媒介记忆的技术和制度负担》(被引频次为 14)一文基于实证研究的设计,以脸书(Facebook)上一个专注媒介记忆研究的页面——DT64 为分析对象,从平台基础设施和用户参

与两个角度考察了在线社交媒体上的记忆实践行为。他们发现由数字技术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给予了普通大众“讲述过去、创造认同”的机会,也进一步见证了记忆主体的去中心化进程。^[16] 安妮特·库恩在《记忆文本和记忆作品:记忆在视觉媒体中的表现以及与视觉媒体的关系》中将记忆理解为一个过程、一项活动、一种建构方式”,并以视觉媒体为例,突出强调在媒介的支持下记忆有望实现制度化。^[17]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教授是记忆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其研究围绕记忆、媒介与社会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展开,尤其关注迅速发展的数字化媒介与记忆之间的碰撞。安德鲁·霍斯金斯的《数字网络记忆》主要关注记忆在数字媒介生态中的存在状态,其研究视角实现了从传统媒介到数字媒介的突破,指出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进步,记忆的时间性、空间性和流动性得到重塑。文章从媒介基础设施的变革出发,发现数字数据成为数字时代记忆的主要存储形式,记忆由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非物质性和可访问性。^[18] 上述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媒介记忆研究的知识基础,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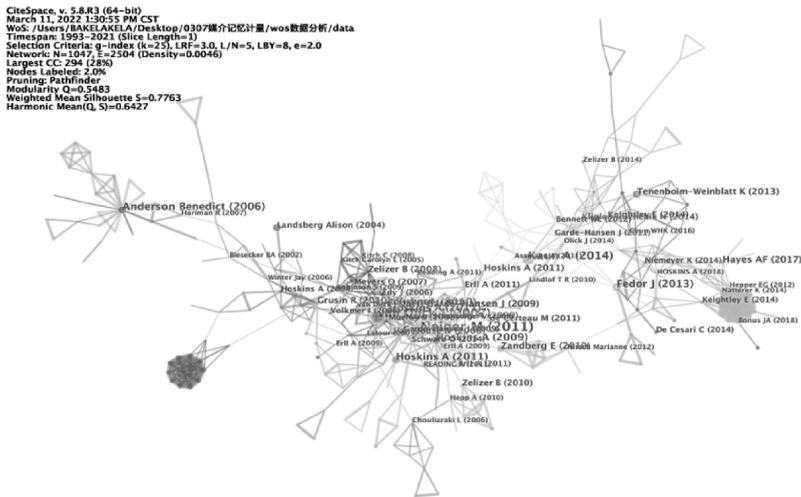


图 5 媒介记忆共被引文献分析图谱

表 3 媒介记忆文献共被引频次排名 Top5

排名	年份	文 献	作 者	被引 频次
1	2011	<i>On Media Memory</i> 《论媒介记忆》	Motti Neiger Oren Meyers Eyal Zandberg	23
2	2007	<i>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i> 《数字时代的媒介化记忆》	Jose van Dijck	17
3	2014	<i>Facebook Time: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Affordances for Media Memories</i> 《脸书时代:媒介记忆的技术和制度负担》	Anne Kaun Fredrik Stiernstedt	14
4	2010	<i>Memory Texts and Memory Work: Performances of Memory in and with Visual Media</i> 《记忆文本和记忆作品:记忆在视觉媒体中的表现以及与视觉媒体的关系》	Annette Kuhn	12
5	2009	<i>Digital Network Memory</i> 《数字网络记忆》	Andrew Hoskins	10

表 4 媒介记忆高频关键词及高中心性关键词一览表

排名	高频关键词		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	Memory (记忆)	313	Memory (记忆)	0.56
2	Media (媒介)	158	Media (媒介)	0.23
3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136	Information (信息)	0.13
4	Information (信息)	74	Communication (传播)	0.12
5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	60	Attention (注意力)	0.10
6	Politics (政治)	59	News (新闻)	0.09
7	Television (电视)	57	Model (模型)	0.09
8	Attention (注意力)	55	Politics (政治)	0.08
9	Impact (影响力)	53	Television (电视)	0.08
10	Communication (传播)	50	Recall (使想起)	0.07
11	Model (模型)	52	Attitude (态度)	0.07
12	Attitude (态度)	38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0.06
13	History (历史)	37	Impact (影响力)	0.06
14	Recall (使想起)	37	Behavior (行为)	0.06
15	News (新闻)	36	Exposure (报道)	0.06

为使媒介记忆的研究热点进一步聚焦,研究者利用 Citespace 的聚类功能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共生成 12 个聚类,得到图 7 所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其中 Modularity $Q=0.5483>0.3$, Mean Silhouette = $0.6427>0.5$,说明该图谱聚类效果好且可信度高。通过归纳整理,可以得到以下 3 个媒介记忆领域的研究热点。

①媒介记忆的功能研究。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媒介记忆的运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唤醒个体记忆、碑刻文化记忆。代表性关键词有“Recall（回忆）”“Emotion（情绪）”“Behavior（行为）”“Culture Memory（文化记忆）”等。本杰明·雅格布森（Benjamin N. Jacobsen）等学者在《量化怀旧：社交媒体、作用和记忆》中指出社交媒体的内涵从一个互动场所向一个回忆空间延伸，过去的记忆能够在社交媒体上转化为可定义的指标从而满足受众怀旧的心理，文章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探讨了媒介记忆形成与实践过程中的关键性指标的作用方式以及对个体记忆的强化作用。^[19]凯·基恩·列（Kai Khiun Liew）等学者的《工业铁路到数字记忆线路：回忆新加坡最后一条铁路》旨在探究人们如何利用 Web2.0 技术对铁路记忆进行归档和共享，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媒介记忆不仅重构了人们对该铁路的记忆，而且将记忆建构的主体由媒介推及拥有媒介的所有人。^[20]

②从特定历史事件出发考察媒介对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这类研究主要以具体历史事件的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媒介纪念的叙事方式，代表性关键词有“Collective Memory（集体记忆）”“Politics（政治）”“War（战争）”“History（历史）”等。阿曼达·拉格克维斯特（Amanda Lagerkvist）在《911 瑞典：在电子记忆场所举行纪念活动》中提出了“电子纪念地”的概念，文章以美国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袭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例，对瑞典电视台创伤记忆呈现策略进行分析，指出在记忆和遗忘两者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电视台试图通过策划多样的媒体纪念活动以保持其作为社会原始记忆库的地位。^[21]马修·艾伦（Matthew J Allen）等学者发表的《铭记 2005 年伦敦爆炸案：媒介、记忆、纪念》一文则重点研究了媒介对 2005 年伦敦爆炸案采用的纪念方式，该文认为探索当代的纪念活动事实上就是探索一个包含多种媒介形态的复杂记忆景观。同时文章也指出当记忆穿过媒介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编辑。因此，媒介叙述记忆的过程也是一个二次选择的过程。^[22]米科拉·马霍迪赫（Mykola Makhortykh）等人则使用 LDA 对俄罗斯博客平台 LiveJournal 上关于苏联战胜纳粹 70 周年相关的纪念话语进行主题建模，发现媒介在建构战争记忆的过程中逐渐沦为政治工具。^[23]

③在媒介技术火速升级的时代，思考媒介记忆的现状与未来。这类研究聚焦与时俱进的技术给媒介记忆实践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代表性关键词有“Social Media（社交媒体）”“Digital Memory（数字记忆）”“Information（信息）”等。英国学者安德鲁·霍斯金斯表示数字媒介将记忆从空间存档中解放出来，数字技术的即时性、丰富性使得公众获许信息与知识的范围骤然缩小，尤其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数字记忆将成为一种新的记忆热潮。^[24]南希·范·豪斯（Nancy Van House）等学者在《记忆技术：关键问题与批判性观点》一文中表示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方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记忆技术和社会技术实践的发展，而就目前来看，这些技术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记忆可以实现复制与分发，一种乌托邦式的、以技术为中心的信念也正在形成，但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人类记忆的反复无常，数字记忆并不能保证完全可靠。^[25]伊亚尔·赞德伯格等学者则在《记忆与数字媒体：全球记忆研究领域的六大动态》中指出数字媒介的发展使得记忆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全球范围流动，从而创造性地提出全球记忆的概念，并总结了全球记忆发展的六大动态，即跨媒介性、速度、广阔性、形态、价态和黏度。^[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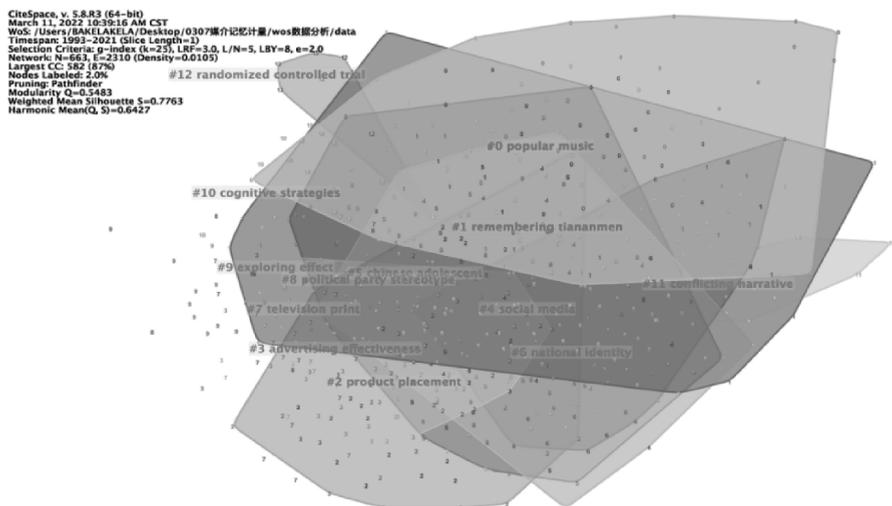


图7 媒介记忆关键词聚类图谱（1993—2021）

（二）研究趋势

对媒介记忆研究领域前沿热点加以追踪，可以帮助我们洞悉该领域的研究走向。Citespace 的突现性检测（Bursts Detection）功能能够根据关键词突发性的频次变化提取突变术语，突变术语的动态性使其展现某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进而辅助预测研究趋势。将文本数据导入 Citespace，以关键词（Keywords）作为突现检测主体，生成图 8 所示的关键词突现图谱，其中“Strength”象征关键词突现强度，“Begin”和“End”分别代表关键词突现的“起”“止”时间，该可视化视图从历时性的角度清晰呈现了媒介记忆领域研究兴趣的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轻松辨识出 1993—2021 年媒介记忆研究的前沿动态及其演进脉络。

1993 年，“Recall（回忆）”这一关键词以 8.4 的突现强度突发性骤增，“Capacity（能力）”在 2000 年以 7.42 的突现强度出现，这表明 1993 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学界扎根于媒介记忆的功能探索，尤其关注如何利用媒介来对抗遗忘、唤醒记忆。2001—2004 年，基于“Television（电视）”这一媒介的记忆研究成果屡有出现，2012 年起一些研究进一步聚焦，开始立足“Television News（电视新闻）”这一媒介记忆形态。譬如，2012 年卡琳·里德尔（Karyn Riddle）发表《年轻人对童年时看到的恐怖故事的自传体记忆》一文，正式拉开了围绕电视新闻开展媒介记忆研究的序幕，该文关注青少年在儿童时期接触的恐怖电视新闻对其记忆产生的长期影响。^[27]而后，玛丽亚·吉利亚基杜（Maria Kyriakidou）在 2014 年发表《观众久远记忆中的痛苦遭遇：记忆的道德等级》，该文注重记忆的实践研究，文中以 47 位希腊电视新闻的观众为例，采用焦点小组访谈的方式充分了解观众如何对电视媒体话语进行挪用、解释和再传播。^[28]2013—2018 年围绕“Limited Capacity Model（有限能力模型）”的媒介记忆功能研究卷土而来。“Social Media（社交媒体）”突现强度为 10.47，说明自 2018 年起该对象成为媒介记忆研究者的重要关切。近几年西方有关社交媒体的研究不只局限于西方主流社交媒体，有关中国本土社交媒体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由此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哥本哈根大学学者刘军（Liu, Jun）参与式观察了微博平台上有关社会记忆的叙事方式，从典型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的网络辩论话语着手，发现微博在某种意义上给予了个人叙述过去、评价历史的机会，个人经验与历史知识得以交织，一个众包的、持续的、积累的、可激活的社会记忆过程正在酝酿。^[29]2019 年开始，“Digital Memory（数字记忆）”成为新一轮的突现词，这体现出在数字技术大放异彩的时代学者研究兴趣的微妙变化。西尔瓦娜·曼多莱西（Silvana Mandolessi）在《挑战数字记忆中的无地点想象：法医建筑作品

时。此外,突发性关键词从“电视新闻”到“社交媒体”的变化,反映出媒介的更迭拓宽了媒介记忆的研究领域,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预见数字记忆将在记忆研究领域长久地占有一席之地。

国外媒介记忆研究范式正在持续积累与变革,研究者遵循普遍接受的研究路径对媒介记忆理论及具体应用进行创新性解读,并创作了不少成果,国内学界应积极借鉴西方学界有关媒介记忆研究的实践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突破。

第一,以点带面,聚焦核心问题,构造体系化媒介记忆研究新生态。海外媒介记忆研究集中于纪念地点和事件的集体和国家纪念文化研究,^{[21][22][23]} 致力于寻找诸如“伦敦爆炸案”“新加坡最后一条铁路”此类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对象。虽然国内大量围绕媒介记忆个案的研究志趣各不相同,已从不同维度对理论进行关照,但是难掩媒介记忆尚未形成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宏大理论体系这一缺陷。研究关照的核心问题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媒介记忆研究取得理论创新带来瓶颈。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是借鉴海外研究趋势,将媒介记忆研究与解决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也就是当我们聚焦于媒介的记忆功能时,应指向于解决国家民族记忆的现实问题。当我们欣喜地发现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的时候,围绕着核心问题与最终诉求的新理论与新范式也必将逐步凝聚。

第二,以数字记忆为突破口追赶海外记忆研究高地。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发展推动海外记忆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变化,逐步转向动态生态,以移动性和交叉性为特点,研究采用和吸收遥远记忆的媒体中介形式。^[30] 快速的技术变革建立了一个新的数字生态,使得记忆与遗忘的冲突不仅存在于媒介世界,更存在于媒介影响下的个体与社会间,这对个人和集体的记忆和遗忘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譬如重点关注技术运作下可能发生的记忆泄露、记忆失真、记忆过剩、记忆的系统性遗忘等问题。此外,“旅行记忆”^[31] 这一隐喻信息全球流动的记忆类型可以从建立社会纵深感的角度为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国内媒介记忆研究无疑还在做着从边缘向核心的尝试,关于数字技术视野下的记忆研究边界相对模糊,缺乏概念化、体系化的理论引导,应当积极吸取海外媒介记忆研究的新趋势与新面向,在拓展疆界的同时形成更聚焦的研究目标与学术领域。

第三,多元化媒介记忆研究的方法创新。量化研究在海外媒介记忆研究中较为普遍,相对于国内主流使用的质化研究方法,主题建模、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设计实验等基于客观数据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研究陷入主观性陷阱的可能,这为我国媒介记忆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借鉴。当然,较多的量化研究也意味着更多聚焦于一种“小而美”的知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于宏大问题与理论的关注,以及向上突破提供理论与现实贡献的可能性。事实上,研究方法终究还是工具,无论质化或量化方法都具备各自的优势与限制。国内媒介记忆研究应当博采众长,一方面需要量化方法聚焦特定主题,解决微观层面的媒介记忆功能与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思辨视角,以定性研究审视宏大视野的现实关照,推动创新理论的形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中国媒介记忆研究的新蓝图。

参考文献:

- [1] [荷兰] 杜威·德拉埃斯马. 记忆的隐喻: 心灵的观念史 [M]. 乔修峰, 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21.
- [2] 邵鹏. 论媒介记忆活跃与凝固的尺度和张力 [J]. 新闻爱好者, 2015 (9): 32-37.
- [3] 邵鹏. 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4.
- [4] 周海燕. 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 检讨与反思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9): 39-50.
- [5] 李红涛, 黄顺铭. 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 [J]. 新闻记者, 2015 (7): 36-45.

- [6] 周颖. 对抗遗忘: 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 [J]. 浙江学刊, 2017 (5): 158-168.
- [7] 陈雍.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媒介记忆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J]. 东南传播, 2021 (10): 16-19.
- [8] 刘峤, 李杨, 段宏, 刘瑶, 秦志光. 知识图谱构建技术综述 [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16 (3): 582-600.
- [9] 陈悦, 陈超美, 刘则渊, 胡志刚, 王贤文.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J]. 科学学研究, 2015 (2): 242-253.
- [10] Morris, K. E & Schwartz, B. (1993). Why they liked IKE: Tradition, crisis, and heroic leadership.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 133-151.
- [11] Kuhn, A. & Hajek, A. (2010). Memory studies memory texts and memory work: Performances of memory in and with visual media. *Memory Studies*, 3 (4): 320-329.
- [12] Kitch, C. (2002). 'A death in the American family': Myth, memory, and national values in the media mourning of John F. Kennedy J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 (2): 294-309.
- [13] Kitch, C. (2008). Placing journalism inside memory—and memory studies. *Memory Studies*, 1 (3): 311-320.
- [14] Neiger, M., Meyers, O., Zandberg, E., (2011).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15] Dijckjose, V.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 Kaun, A. & Stierstedt, F. (2014). Facebook time: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affordances for media memories. *New Media & Society*, 16 (7): 1154-1168.
- [17] Kuhn, A. (2010). Memory texts and memory work: Performances of memory in and with visual media. *Memory Studies*, 3 (4): 298-313.
- [18] Hoskins, A. (2009). *Digital network mem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19] Jacobsen, B. N & Beer D. G. (2021). Quantified nostalgia: Social media, metrics, and memory. *Social Media + Society*, 7 (2): 1-9.
- [20] Liew, K. K., Pang, N & Chan, B. (2014). Industrial railroad to digital memory routes: Remembering the last railway in Singapo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 (6): 761-775.
- [21] Lagerkvist, A. (2014). 9.11 in Sweden: Commemoration at electronic sites of memory.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15 (4): 350-370.
- [22] Allen, M. J. & Bryan, A. (2011). Editorial: Remembering the 2005 London bombings: Media, memory, commemoration. *Memory Studies*, 4 (3): 263-268.
- [23] Makhortkyh, M., Lyebyedyev, Y & Kravtsov, D. (2020). Past is another resource: Remember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day on LiveJournal. *Nationalities Papers*, 49 (2): 1-14.
- [24] Hoskins, A. & Halstead, H. (2021). The new grey of memory: Andrew hoskins in conversation with huw halstead. *Memory Studies*, 14 (3): 675-685.
- [25] Van House, N. & Churchill, E. F. (2008). Technologies of memory: Key issues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Memory Studies*, 1 (3): 295-310.
- [26] Reading, A. Neiger, M., Meyers, O. & Zandberg, E. (2011). *Memory and digital media: Six dynamics of the global memory fie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27] Riddle, K. (2012). Young adults'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of frightening news stories seen during childhoo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 (6): 738-756.
- [28] Kyriakidou, M. (2014). Distant suffering in audience memory: The moral hierarchy of remembe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1474-1494.
- [29] Liu, J. (2018). Who speaks for the past? social media, social memory,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1675-1695.
- [30] Mandolessi, S. (2021). Challenging the placeless imaginary in digital memories: The performance of place in the work of forensic architecture. *Memory Studies*, 14 (3): 622-633.
- [31] Erl, A. (2011). Travelling memory. *Parallax*, 17 (4): 4-18.